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编
彼得·纽曼

第一卷: A—D

经济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2 号

责任校对: 刘 萍 段健瑛 闻志刚

封面设计: 卜建晨

版式设计: 单 于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一卷: A—D

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彼得·纽曼 编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 69印张 2500000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8-0403-0/F·328 定价: 112.50元

(限国内发行)

《政治经济学辞典》第一版

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 编, 共三卷:

第一卷, 1894 年印。1901 年、1909 年出 1—256 页修订的修订版。1915 年、1919 年出修订版。

第二卷, 1896 年印。1900 年重印。1910 年、1915 年出修订版。

第三卷, 1899 年印。1901 年重印。1908 年出增加了附录的修订版。1910 年、1913 年出修订版。1918 年重印。

新版, 书名改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

亨利·希格斯 编, 共三卷:

第一卷, 1925 年印。1926 年重印。

第二卷, 1923 年印。1925 年、1926 年重印。

第三卷, 1926 年 2 月印。1926 年 5 月重印。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 编

共四卷, 1987 年出版。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PETER NEWMAN

Volume 1
A to D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翻译编辑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名单

主编： 陈岱孙

副主编： 董辅初 罗元明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仇启华	厉以宁	代 成	朱绍文	朱景尧	刘涤源
许邦兴	孙世铮	巫宝三	吴大琨	沈仁干	沈志求
宋 涛	宋则行	宋承先	闵庆全	张培刚	陈观烈
陈彪如	易梦虹	罗元铮	胡代光	胡企林	胡寄窗
高鸿业	浦 山	陶大镛	黄范章	崔书香	蒋学模
谭崇台	樊 亢	滕维藻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清文	万光明	王宏昌	刘同舜	孙鸿敞	李庆云
李松年	杨敬年	杨德明	肖高励	张效英	陈锡康
范国鹰	范家骧	郑伟民	胡世凯	钟学义	姚子范

编辑部：

主任： 范国鹰

副主任： 张 虹

第一卷责任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沙超英	张 红	张 虹	张惠敏	陈 捷	范国鹰
龚 援	康 立				

中文版序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由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约翰·伊特韦尔、美国哈佛大学的默里·米尔盖特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纽曼三位经济学家主编，于1987年底问世的《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的中文译本。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前身，或者说其第一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Robert Harry Inglis Palgrave)主编，于上个世纪末问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这第一版经济辞典是一部用英文编纂的这一类巨型辞书的第一次尝试。巧合的是，在这同一时期，法、德两国也分别先之开始以分册分期连续出版的形式编纂了法文的《新政治经济学辞典》(《Nouveau Dictionnaire d' Economic Politique》)和德文的《国家学辞典》(《Hand 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帕尔格雷夫还曾引证这一事实为其编纂辞典的理由，这三部辞书在两世纪之交成为分庭抗礼的权威性的经济和政治辞书巨著。

帕尔格雷夫的原版辞典共分为三巨册，分别出版于1894年，1896年和1899年。如果把1891—1892年三本从A到C的试版小分册的出版算起点，再把1908年才补进第三册“附录”作为本册的最后完成，则出版的周期足足为17年。在本世纪的头20年中，这三巨册都分别作了几次略有修订和补充的重印。这辞典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辞条包括了一系列由当时最出色的经济学家执笔的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和一个相当广泛的人物传记辞目。这一优势使得从出版之日起，它立即得到经济学者的欢迎，并保证其在出版后半世纪中，继续处于经济文献中心的地位。《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三主编之一的米尔盖特教授说过，它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最出色的学术成就之一”(《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3卷，第846页)，这一赞词并非溢美。

由曾经协助帕尔格雷夫工作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亨利·希格斯修订的第二版，是在原版出版后二十几年，也分为三册，于1923年至1926年分册分期出版的。希格斯在书名上加上帕尔格雷夫的姓，成为《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

这第二版正文的绝大部分所用的，都是原版的旧铅版。所以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第二版对于原版所作的改动不多。它更多地是通过下列两个渠

道对原版中已失去时效的内容进行修订。第一,在每册后面增加若干附录,以对在原版编纂后去世的经济学家的传记加以补充,和对于正文一些条目作一些增补。第二,对于原版正文中某些段落作新旧内容更替的改动,但相互更替的新旧字数必须相同,以保留原来印片上条目的排列和页数的不变。希格斯对于这一情况很不满意,但如他自己所说的,太大的改弦更张需要很多费用,这是为当时条件所不允许的。这就使得这第二版基本上保留了第一版的面目,第二版各册,在分期出版后,都在1926年全面出了重印版,但在是后就没再行修订了。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约请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和纽曼为他的合作者,于1983年开始编纂,1986年编成,1987年9月出版的。本书由世界34个国家900多位知名学者——其中包括13位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12位——编写。全书收辞条2000多条,涉及经济学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和最新的发展;并包括约700位近代和现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小传。全书分订为四册,共4000多页,约400多万个英文单词——比初版辞典多约1/3。书名改称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表示其为继希格斯修订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之后的新版。

这本新辞典的出版去希格斯的1926年修订版的出版相隔已61年。在这60多年中,也出版了一些用英文编写的经济学词书——目前大约有20余种。其中,有的是关于某一部门经济的,也有一些是综合性的。但是,它们几无例外都是小型的。它们之中的半数只是释义式的词汇汇编,其余也不过是对一些具体题目的轮廓作简单的描述。而在这间隔的60多年中,经济学,无论在范围、内容、题材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今天成为人们极大注意的问题,在几十年前,或者还处在萌芽形态,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使某些领域已成为今日经济科学的次级学科;而即在旧版中,已涉及的传统各方面经济问题的内容,也已进展到和旧时所描述者不可辨认的地步。其结果是,这本新辞典编写,不是对于帕尔格雷夫的初版,甚至于也不是对希格斯的修订版的添改修补,而是一个完全另起炉灶的工作。在初版中,在当时有兴趣,而在今日不经常接触到的若干辞目被取消了;代之者则为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生经济事物的题目。而在对于仍然保留在新版中的原版各领域的各旧辞题,则几乎全部作了崭新的改写。据统计,原版旧辞目收进这新辞典者,只有由二十几人写的大约50条。这些辞目被保留收入新辞典的理由,据出版社经理编辑马戈特·利维在编首凡例中说的,“是为了加强‘老’的帕尔格雷夫和这本新的辞典的连续性”。但这一部分的辞目的分量,在一部由900多人编写包括2000个条目的辞典中的比重,可算是微乎其微了。所以,三位主编在“编者前言”里说,“初版辞典在这里所遗留下来的如此之少,以至把后者叫作前者的第三版,显然是失真的”,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

理的。

但是,一方面不承认新帕尔格雷夫是原辞典的第三版,却另一方面又在书名上保留着帕尔格雷夫的字样,编者还是有他们的理由的。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在这引文下面所接着说的,“我们相信《新帕尔格雷夫》保留了帕尔格雷夫原作中一些开明的和学者的精神。至少,它和它的前身一样,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主要论述其理论和应用方面,而略于其形式和制度的细节。后者,在成书之后不用几年就会失去时效,对于打算准备作为较长时间应用的出版物来说,这样的贬值速度未免太快了”。

第三版也好,新版也好,由于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由于初版于1926年修订后60年没有新的修订本而大大地过时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迫切地需要有这样的一部大型的、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型的经济学大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出版就成为80年代经济学界一件大事和经济学文献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得到经济学界的赞赏。

赞赏者是绝大多数,但如一切这类供应给多种不同口味和要求的读者的书籍一样,它总不可避免听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的呼声,或求全的责备。

最明显,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在2000条辞目中,有关人物和辞题收入与否的选择问题。例如,巴赫拉姆·诺扎德在发表于1988年6月号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杂志上的对本书的一则书评中,就曾提出关于这方面的一系列疑问。对谁和什么机构应列入的问题,他说,读者会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未被立条感到惊讶,“毫无疑问,让·莫内(Jean Monet)至少和休·多尔顿(Hugh Dalton)或休·盖斯克(Hugh Gaiskell)同样有被立条的资格。W·W·罗斯托(W.W.Rostow),H·W·辛格(H.W.Singer)、拉·敏(Hla Myint)和塞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又哪去了,更不必说其他像佩尔·雅各布森(Per Jacobssen)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了。”对于某些经济机构的遗漏,则他认为是极端不现实的,他指出,它收入了“美国经济协会”、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没问题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是它却遗漏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支付同盟”,“欧洲货币体系”,“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认为,编者并没有由于有意略于形式和制度的细节的原则,而排斥所有的机构。他们收录了著名的法国“国立桥梁和公路学院”,却遗漏了有同样(如果不是更)大声望的法国“高等师范大学”。他最后点出,“当人们在关于‘圣殿骑士团’这一奇特机构的辞目中,看到下列的奇文时,也许这一切都是可以饶恕的了”。这段奇文是:“……他们接受阿奎那所承认的原则行事;一个贷款人可以在合同中规定向拖延还款者索取赔偿费,而不算有罪。”对于什么题目应该立条,什么题目不必立条,这个书评者也有不少意见。他对于“货币怪论者”、“免费午餐”、“狩猎和采集经济”、“修辞学”、“欢乐与痛苦”、“罪与罚”都立了辞目,而人们所期待

的至少会有简短辞目的“马歇尔计划”，“出口悲观论”，“调整计划”，“绿色革命”，以及“供应学派经济学”却全赋缺如，感到不解。他的最大困惑是为什么几乎没有关于日本的辞目。该书评者认为辞目的取舍的失当，是本书的一大缺点。

辞目取舍本来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不同意见的问题。人们对当年的帕尔格雷夫的初版，在这方面，也就同样地提出了不少意见。例如，由小库图瓦写的并无名气的沃洛斯基(Wolowski)辞目占了两栏半的地位，而由他写的魁奈辞目只占两栏；这难道只可以归咎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力吗？又如，按初版的凡例，在世的经济学家都不在收录之列。但里昂·瓦尔拉^①却是例外。而更足引起非议的是其所举收录的理由——因为里昂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已被列为辞目，列入里昂只是为了更好地论述奥古斯特。

众口本来难调，更不能对这类辞典要求其尽善尽美。对《新帕尔格雷夫》也应如此。应该承认，本书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偶然的疏忽，但有的遗漏确是受上面所说的，偏重于理论和应用的问题而略于其形式和制度细节的原则所规范；而有的则还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决定的结果。主编者对于读者这一类批评很少有答复解释的机会，或者也没有这种义务。假如有的话，也许编者对某些不满意的意见还是可以提出一些站得住的相反的见解。例如，上面书评者诺扎德所提出被忽略的词汇中之一的“供应学派经济学”，就可能是一个例子。这个从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所谓供应学派，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的确在西方经济学界做出许多喧嚣，而英美两国执政者的青睐又赋予以某种引人注目的地位。美国《挑战》杂志1988年三—四月号发表的对《新帕尔格雷夫》主编伊特韦尔的专访中，就提出了没有供应学派的词目是否为偶然忽略的问题，这正好给主编者一个答辩的机会。伊特韦尔的答复是，“这样事绝不出于偶然。我们对供应学派经济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定所谓供应学派经济学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曾经有过一种围绕着，没有任何明确理论核心的一个经济思想大杂烩的运动。它宣扬的是市场和反控制的有效性；在边际税率、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着一些宏观经济关系。”供应经济学派的人物，或者他们的追随者，也许不会接受伊特韦尔答辩的理由，但他们应该看到编者对于收录与否并不是草率从事。而“没有明确理论核心”的评语却恰恰打中了供应学派的要害。

我们并不是说，对于每一批评或不满，编者都能有一个现成的象上面那样振振有词的回答。我们不能期待一本辞典能够满足一切人们的一切要求。《新帕尔格雷夫》并不例外，也不是尽善尽美。但总的说来，它无疑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巨著。除了它记录着这大半世纪以来经济学的新部门的生长、发展；旧领域内容的扩大、更新；述介了这同一时间对于这门学科

^① Walras 的准确音译应为“瓦尔拉斯”，此处从“约定俗成”原则。

进展作出贡献值得学者查阅的思想家的学术成就等等之外,一个特别应为辞书编纂者引为典范的是,《新帕尔格雷夫》并不要求辞目的作者四平八稳地用所谓眼前经济学界共同接受的观点,来对一切经济思想作出综合平衡阐述,而是为经济学界各方面的权威人士提供一个能自由地、准确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分析和观点的机会。伊特韦尔在答复《挑战》编辑的专访中就曾说过,“我们渴望,每个作者不要试图对某个问题作平衡的阐述,而是应该表现他自己对这问题的观点,包括个人的偏见。然后,我们编辑的任务是,通过选择提对立观点的作者撰写同类问题的辞条,使整部辞典得到某些平衡。这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取得多样化的必要性”。让“对立观点的作者撰写同类问题的辞条”,实际上意味的是“同一问题可以有几个类似的,但又不同标题的,复合辞目”(本书“编者前言”,第ix页)。这个编辑原则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出版当然取代了初版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但是“取代”是否意味着旧版已完全无用,可以完全废弃掉呢?没有问题,旧版中除了极少数者外,几乎全部辞目的内容都失去时效。但失去时效是否等于一无价值,仍然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从而,“取代”并不应等同于“废弃”。本书的出版说明作了如下的声明:“为纪念《新帕尔格雷夫》的出版,本出版社重印了原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出版说明”,第vii页)。这是有意义的,有见识的。

为了尽快地和高质量地向国内经济学界和广大读者奉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一书的中文译版,经济科学出版社大力作了组织该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它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个研究单位和大学的百余名学者进行译作,在各上述单位设置翻译点,并在各翻译点之上成立了翻译编辑委员会,以收各工序相互协调之效。全书译成中文估计约1000余万字;依序安排各册译、校、审、编、印等等工作。我们相信这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将会成为国内一切从事于认真学习、研究经济学的个人及机构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陈岱孙

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

中文版编辑说明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以下简称《新》书)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辞书,其内容涉及范围远不仅限于纯经济学,还广泛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宗教等等,以及数学、环境等自然科学学科和边缘学科。英文原版编辑在词条选择上做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和自然的,但这无疑给中文版的翻译组织工作和翻译工作本身以及编辑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适应这一情况,我们采取了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翻译点的翻译工作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地方具备学科设置比较齐全、图书资料条件较好的学术环境。在各个翻译点,由有资格的学者领衔,组织他认为合适的人选参加翻译和校定工作。这些翻译点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华中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及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国家安全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另外,我们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合适的学者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在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中,包括我国老一辈知名专家,勤奋有为的中年学者,以及学有所成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对于他们为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所做出的严肃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努力,我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新》书中文版编辑工作中碰到最多的技术处理问题是专名——主要是人名的译文统一问题。由于地名、书名、公司名等专名虽也存在一名多译而使人产生误解的问题,但这些专名在书中重复出现率较少,所以我们只是遵循有关的工具书做了译名统一处理,少数查找不到而又有些特殊的,用圆括号在译名后给出了英文,经这样的常规处理后大致可保无虞。

而人名的处理则不然。全书在各种场合出现的人名很多,其中许多人名在不同的词条中多次出现,而且人名的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给出姓氏,不给出本名和教名(或缩写字母)。为了避免一名多译,我们做了这样的技术处理:首先,每个人名在一个词条中首次出现时,用圆括号给出英文原文。这样,即使出现一名多译,也有英文原文供读者参考。其次,在姓名翻译上力求统一。我们规定了以《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版),

《世界姓名翻译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版)等国内现有的几种工具书为标准,按照名从主人等翻译的原则,由编辑在译稿加工过程中对每一次出现的人名均做认真查对及订正,查不到的姓名则写成卡片归档存库,以“先入为主”的原则供后来者遵循。

但姓名译文的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了,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待处理。一是约定俗成的问题,这主要是指古典和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姓名的翻译。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我们一般以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卷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里出现的人名中译为准。如Smith译为“斯密”,不译“史密斯”,Ricardo译为“李嘉图”,不译“理卡多”,Walras译为“瓦尔拉”,不译“瓦尔拉斯”等等。但是,对现代经济学家的名字则做了一定的规范化处理,如荷兰著名经济学家Tinbergen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译为“廷贝亨”,但为了照顾旧译习惯以免误会,在特别需要之处加注(旧译丁伯根、廷伯根),等等。另外,有些数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名学者姓名,若按规范译法,虽在经济学界读者中一般不大会引起混乱(因为他们一般并不熟悉这些人中译名的已有译法),但考虑到有关专业读者的习惯和学科之间的衔接,我们也通常做了“约定俗成”处理,如Euler(尤勒)定理译成欧拉定理,等等。

另外一个姓名译法的特殊问题是日本人姓名的英译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姓名的英译中问题与此有些类似)。虽然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姓名译名手册》可资遵循,但它并非“包揽无遗”,而且更突出的问题是,同一个用英文拼写的日本人音译姓或名有多种备择译案,到底用哪一个呢?除非确实知道此人姓氏的日语汉字写法,否则难以正确判定。对这类问题,我们的处理方法一是想方设法查阅有关参考书找到已有的译案(假设它是正确的),二是给个参考译文,同时遵循前述原则,在一词条中首次出现时给出英文原文,即使译文不确,亦当无虞。

关于目录和附录处理问题。《新》书的英文版原书按字母排列,四卷本,每卷之首给出全书目录。中文版仍按原版字母排列,分为四卷,也在每卷之首给出全书的词条目录(英—汉文对照)。在全书末尾的附录部分给出按中文笔划排列的全书总目录(汉—英文对照)。英文版附录的部分内容,考虑到对中文版读者的实用价值不大,予以删除,只保留了原附录部分中的“专题索引”(英—汉对照)和“内容索引”。

关于译注问题。我们考虑到译注取舍的标准随意性较大,并且在版面安排上有一定困难,所以原则上不加译注。个别非加不可的,如大致(而非完全)肯定英文有拼写或用词上的重大错误时,采取在文中用圆括号做简单声明的方式做译注。

最后需说明的是,《新》书的作者多为西方学者,他们的学术观点当然与马列主义有这样那样的分歧或对立,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的分析和理论概括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是十分鲜明的。考虑到本书中文版是一部翻译作品,并且它是作为一部学术工具书奉献给读者的,所以在仅限于学术探讨而非恶意攻击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于他们的若干非(或反)马列主义的理论阐述基本上采取原文照译的处理原则编辑处理。同时,在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上,我们作了一定的限制,我们相信读者会做出自己的批判性分析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中文版编辑部

出版说明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前身，是R·H·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Inglis Palgrave)编辑，于1894年、1896年和1899年出版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辞典》。在本世纪的头20年里，该书经修订和补充而重印过。1923—1926年，由亨利·希格斯(Henry Higgs)编辑，经全面修订的该书新版——《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问世。(若要详知该书初版及后来各版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的辞条“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为纪念《新帕尔格雷夫》的出版，本出版社重印了初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

从帕尔格雷夫的《辞典》初版问世以来，经济学的内容和影响显著地扩大了。许多如今人们怀有极大兴趣的题目，在上个世纪末或者尚处于襁褓之中，或者人们还一无所知：城市经济学、经济人口统计学和数理经济学的认真研究才刚刚开始；诸如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对策论和不确定性经济学等领域尚在拓荒阶段。自那时以来，在《辞典》初版探讨过的那些领域，学术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货币与金融、国际贸易以及一般均衡理论等等已成为20世纪的经济学。因此，时下确是编辑出版帕尔格雷夫辞典新版本的恰当时机，像它的前身一样，这个新版也是通过对经济学说做广泛的批判性陈述，努力反映这个学科的发展状况。

本书的准备工作于1983年开始，三位编辑——三一学院(剑桥)的约翰·伊特韦尔、哈佛大学的默里·米尔盖特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的彼得·纽曼——列出了初步的辞条条目，并邀请大约100位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其事。经过深入讨论和协商，编辑们筛选和确定了条目，并约请数百名学者撰稿，他们的学术专长堪称当今经济学各个分支和各种观点的代表。

辞条文稿由编辑们分别在剑桥和巴尔的摩进行编辑加工，然后交伦敦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本书包容了近2000个单立的词条，由900多位学者撰写；全书四卷可充分交叉参阅，并在“凡例”中对各种参阅检索方法做了说明。

编者序

在189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第一卷的序言中，R·H·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写道：“（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给学生提供工具，帮助他们理解当代的经济思想发展状况。”虽然自那以来已过了近一个世纪，经济学的变化和发展超出了帕尔格雷夫时代人们所能想见的程度，但同样强烈的社会需要促使我们编辑《新帕尔格雷夫》。

为了适应经济学的发展，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感兴趣的许多辞条不得不有所割爱。诸如公共资财的管理、外国币制、土地占有制度、一些法律和商务条目、社会机构以及其他许多题目，都是人们感兴趣的，但正如亨利·希格斯在这本《辞典》的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这些题目“与经济学只有疏远的联系”。有些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支学科，在帕尔格雷夫时代还尚未出现，如经济计量学、对策论、凯恩斯经济学、最优理论、风险和不确定性及其应用的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城市经济学；有些理论在当时还在襁褓之中，这些年来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已有了巨大的发展，如经济周期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这两个方面都取代了被割爱的那个部分。

初版辞典在这里所遗留下来的如此之少，以至把后者叫作前者的第三版，显然是失真的。但正如《新格罗夫(辞典)》的编者所为，“确保《格罗夫》前几版的某些优良的人道传统在新版仍有体现”，所以，我们乐于使《新帕尔格雷夫》保留帕尔格雷夫事业的某些自由主义和学术神韵。至少在以下这一点上，《新帕尔格雷夫》与它的前身相同：阐述经济学的种种问题，主要是阐述其理论及应用方面，而不是作一般的详述和具体介绍体制机构。如果像后一种写法，书成之后，用不了几年就会过时了，对于一种要争取有更长时间收藏和应用价值的出版物来说，这样的贬值速度未免太快。

虽然《新帕尔格雷夫》并没有打算兼收一部经济学家辞典的内容，但实际上，在其近2000个辞条里有700多条是著名经济学家的小传。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主要以英文写作的（特别是英国的）重要经济学家的情况，以及以其他文种写作的主要经济学家的情况，尽可能在本书得到充分反映。也许是受其供稿人C·P·桑格(Sanger)的蒙蔽，帕尔格雷夫从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只选了瓦尔拉(Walras)单列词条，他这样做的根据相当古怪，据说是因为“他全盘继承了其父安托万·瓦尔拉(Antoine Walras)教授的衣钵，若不介绍儿子的著作，就不可能评述老瓦尔拉”。我们则收录了相当多目前在世的经济学家的小传，因为本世纪内经济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如果不把许多在世的最杰出经济学家包括在内，那将对本书

的实用性和收录范围造成严重的损失。为了减少人物评价上的一些明显麻烦，我们采用了这样的时间下限：收入本书人物辞条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他在1986年1月1日以前已到了70岁。

对于许多非人物传记性的题目(有大有小)，我们采用相似但不同的标题的多条入录法，力图多角度地予以阐述。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这类词条向读者介绍研究结果和方法时力求公正和准确，而且不搞“平衡”。一如既往，读者若想形成那样一种全面的看法，可利用书中的交叉参阅系统去查阅其他有关辞条。这意味着读者须多花些功夫，但他也会因此而相应地得到更大的收获。

辞条的规模与编者认为它所涉及的人物或题目的重要性之间显然有大体一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远非完美无缺。这项工程的最终结果，并非总是符合我们当初的计划。所幸的是，我们在编辑工作过程中获得不少教益，并因此而对当初的计划不断做出修改。这种调整有助于成品提高质量，而不是为了追求绝对的首尾一致。在这方面，没有一个读者会不赞同本书处理某些材料的详略取舍原则：省略掉那些令人厌倦的题目，这种重要的省略实在有益无损。要完全避免在详略取舍方面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希望读者将会发现，在所难免的这类错误绝非出于偏见。

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偏见。我们不仅要全面论及当代经济思想，而且还要像帕尔格雷夫本人那样，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进行深入的论述。因此，我们要求作者在撰写辞条时，要交待有关问题的过去，展望它的将来，并分析它的现状。有些题目自然要比其他题目更适合于用这种方式撰写，当然，有些撰稿人要比其他作者更为同意我们的想法。但大体来看，他们都很好地体现了我们的要求，有些作者在这方面干得十分出色。

帕尔格雷夫是他的《辞典》的唯一编辑，他为之倾注了多年心血。不过在他的作者队伍里，有几位不仅为他撰稿，而且向他推荐辞条和撰稿人，并通过报刊宣传他的事业。我们力求像帕尔格雷夫那样使编辑班子小而精，但我们与他不同的是不得不请众多赞助者提供慷慨和友好的援助(这种援助之大，远远超过一般的预期)，他们为数众多，以至我们不可能一一列名表示感谢，否则读者会大倒胃口的。但我们必须提及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经理编辑马戈特·利维(Margot lery)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热情而又细致的工作对于本书按时完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还得特别感谢安·莱斯利(Ann Lesley, 剑桥)和唐娜·霍尔(Donna Hall,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她们总是愉快而又十分内行地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本书的编辑工作使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与外行的看法正相反——经济学界是团结一致的。许多事情可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约稿得到了极其友善的反应，而这些受邀请的经济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存在着广泛差异。我们约请的作者中，有80%以上同意参加编写工作，而那些表示拒绝的人几乎都表示了歉意，并鼓励此事成功。回顾往事，编辑之艰辛几已淡忘，而条目汇齐之日，真令人雀跃三百，近千名作者寄来的文稿大都写得很好，有不少更是杰作，处理这些文稿不

断地给我们以鼓舞。我们希望读者将能分享我们的大部分欢乐，不必老记着我们笔耕之苦。

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彼得·纽曼

1987年1月

255